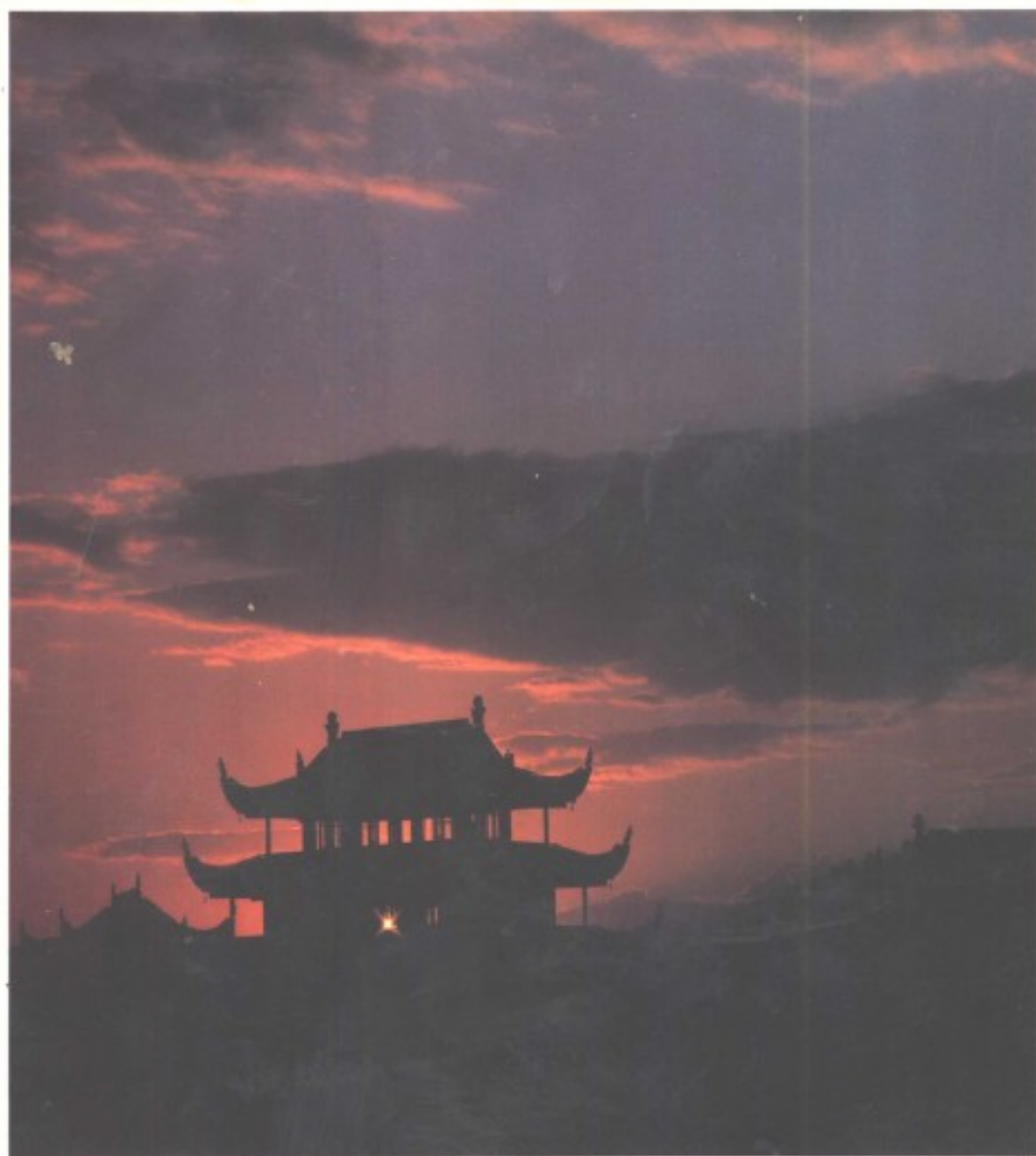


杨慎初主编

湖南传统建筑

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HUNAN



湖南教育出版社

湖南传统建筑

TRADITIONAL ARCHITECTURE
IN HUNAN

主 编 杨慎初 副主编 熊传薪 巫纪光

湖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

湖 南 大 学 建 筑 系 合 编

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

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

湖南传统建筑

杨慎初 主编

责任编辑: 常继大

美术编辑: 熊玉心

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东风路附1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89×1194毫米 16开 印张: 20.5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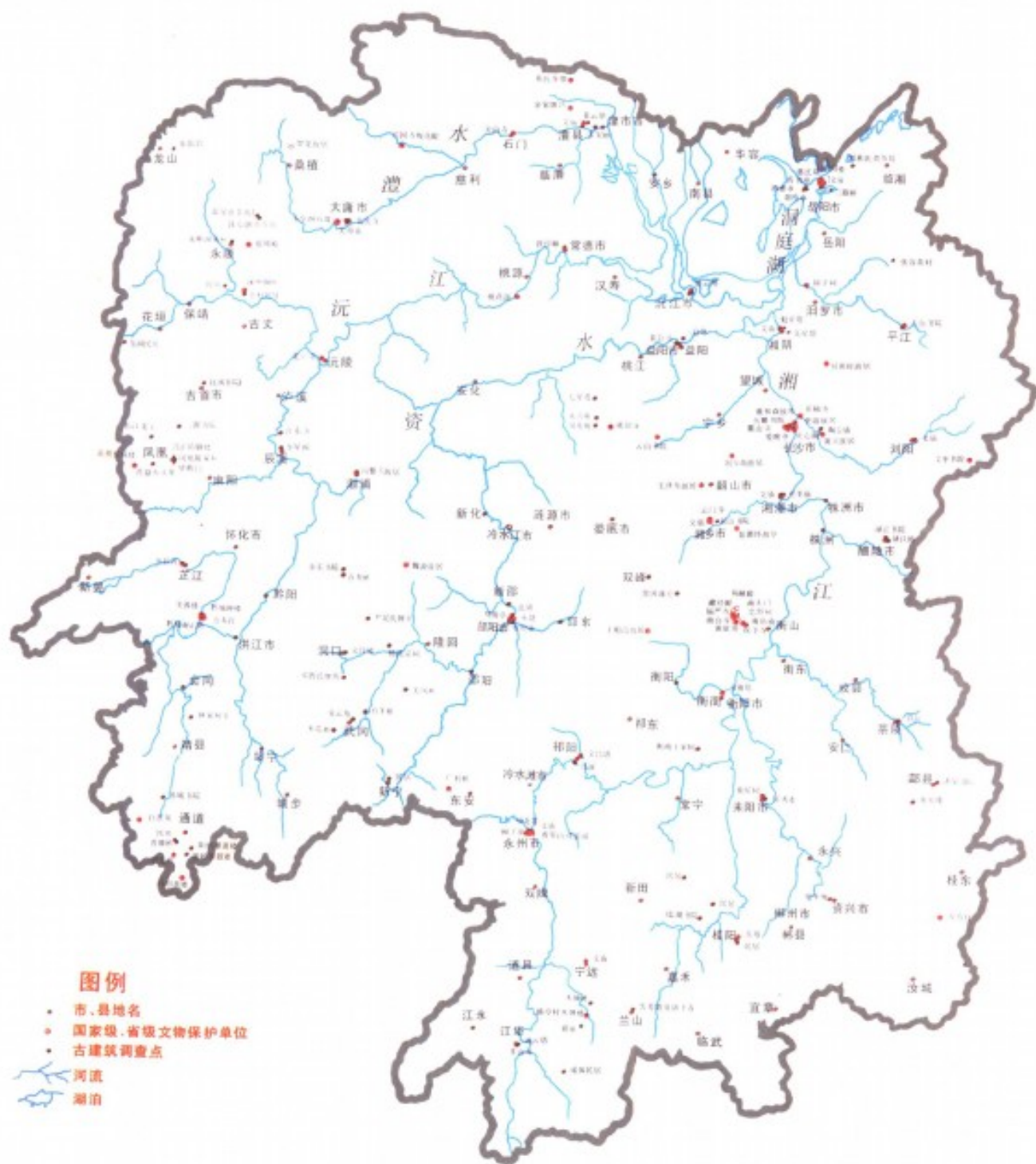
ISBN7-5355-1653-X/G·1648

定价: 218元
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(湘) 新登字 005 号

湖南古建筑分布图



宗文化結

賀湖南傳統建築

多美

黃良

譚

一九九三年春



匯



湘
傳

純

建
筑
精

王
融
文

总 目 录

综述	1
寺庙	25
文庙	81
书院	107
祠庙、会馆	141
楼阁亭台	169
塔、幢、桥、坊	221
民居	261
后记	320

综 述

伟大祖国悠久的文明历史,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。作为文化结晶的传统建筑,源远流长,一脉相承,形成了以木构为主,卯榫结合和模数制、规格化、装配式的独特建筑体系,具有较强的传承性和溶合力,较大的适用灵活性和表现多样化,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其重要地位,是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,神州大地的文化奇葩。

湖南的传统建筑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,融化了多民族的智慧创造,成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又由于地理条件、文化历史、民族习俗的差别,表现其地方性、时代性、民族性的特点,在共性中体现出湖湘文化的个性特色。

人们适应自然地理条件,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开拓生活环境,对于传统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,反映出显著的地方性特点。

重要的地理位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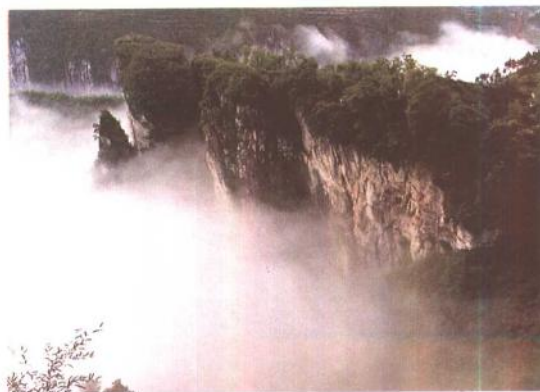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省地处东经 $108^{\circ}47'$ ~ $114^{\circ}15'$, 北纬 $24^{\circ}39'$ ~ $30^{\circ}08'$ 之间,在我国南部长江中游地区,基本处于洞庭湖以南,故名湖南。省内最大的河流湘江,贯穿全省南北,形成湖南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带,故又简称为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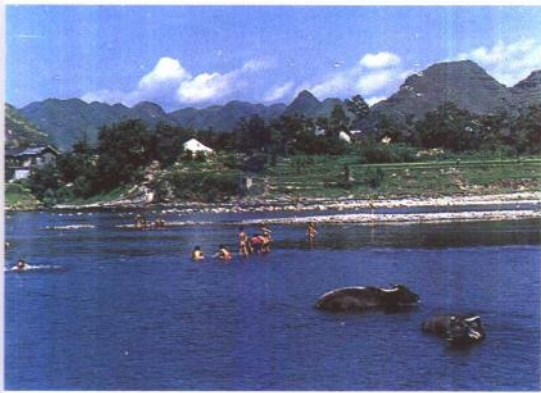
省境毗邻六省(区),北连湖北,南接广东、广西,东邻江西,西靠四川、贵州,自古成为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,因此为其文化交流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,与邻省地区、民族建筑的相互影响也十分明显。

复杂的地形条件

全省面积 21 万多平方公里,占全国总面积 2.2%,居全国第 11 位。由于地处云贵高原至东南山丘,和南岭山地至江汉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,地形较为复杂多样。北有洞庭湖及河湖冲积平原,东、南、西三面为幕阜、南岭、武陵和雪峰等高山环绕,成为向北开敞形如簸箕的盆地结构形式。境内山峦丘岗起伏,山地约占一半,丘陵岗地约占 $1/3$,平原较少,形成山重水复的地貌特点,俗称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。河谷纵横密布,5 公里以上大小河川达 5000 多条,形成湘、资、沅、澧四大水系,支流遍布全省。除个别河流属于珠江和赣江水系,其它河流基本上呈一扇形汇入洞庭湖,构成完整的向心网状水系。这对于湖南行政区划较为稳定,经济文化发展较为普及,城镇建设沿江河分

白云深处有人家





水乡风情



高山出平湖

布较为均匀,产生了深刻影响,同时也形成山丘平原不同地域建筑的诸多差别。

温湿的气候特点

湖南纬度偏低,距南海较近,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,热量丰富,雨量充沛,四季分明,植物生长极为有利。山青水秀的优美景观特色,为城镇及建筑设计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早有《永州八记》名篇,描绘永州八景,开山水散文的先河。宋代画家米芾为“潇湘八景”题诗作画,更突出了湖南的风景特点。湖南各地,以致一些乡镇和书院,也多有其“八景”、“十景”,反映其景观特色,历为文人们所赞颂。诚如宋代诗人陆游所称:“挥毫当得江山助,不到潇湘岂有诗”。如气象万千的君山,气势磅礴的南岳山,幽深秀丽的岳麓山、桃花源、苏仙岭等等,久已成为著名的名山胜地。又如奇峰突起,千姿百态的张家界、索溪峪、天子山,以及其他丰富的风景资源,尚待开发。

湖南冬季北风,凛冽干寒,冷空气影响较大,尤其湖区开敞,较为寒冷,但为期不长。夏季南风,淫雨多云,潮湿闷热,尤以湘中和湖区,地处两湖盆地之中,周围山地阻隔,不易散热,形成高温,延续时间较长,成为长江流域的“火炉”之一。因此其传统建筑较为高大,讲求南向、穿堂风和遮阳等降温措施。山区温差较小,建筑依山就势,则朝向通风等要求不十分严格。

湖南是我国雨水较多的省份之一,年平均降水量 1250~1750 毫米。且阴雨较多,湿度较大,年相对湿度在 80% 左右。尤其雨水较为集中,4~7 月俗称梅雨季节,阴雨连绵,山洪水患较多,虫蚁孳生为害。因此对于建筑的避雨、隔潮、防虫害,以及沿河湖的防灾等都是极为重视的问题。

丰富的物产资源

湖南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,植物和矿物资源非常丰富。

自春秋战国以来,就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,素有“鱼米之乡”的称誉。植物种类多达 5000 余种,其中木本植物有 2000 余种。森林分布较广,杉松尤其丰富,西湖木、江华杉、茶陵松等久负盛名,樟、梓、楠木及竹材种类颇多,都为建筑提供了丰富的用材。优良的桐油、生漆,又为木构及其雕饰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

由于湖南地质地理条件的复杂,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金属和非金属的丰富矿藏。已发现的有色金属多达 111 种,被誉为“有色金属之乡”。其中锑矿著称于世,又有“世界锑都”之称。铅、锌、钨等矿藏都居全国前列。已探明的非金属材料也有 100 多种,因此又被称为“非金属材料之乡”。其中雄黄、萤石、海泡石、石煤、独居石等储量,都居全国之首。长沙汀泗湾麻石、湘乡和桃江大理石、祁阳白石、邵阳等地的青石,以及其他石料,都被广泛用于建筑,并为湖南传统石构雕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。煤的广泛开采,又为砖的普及应用,以及陶瓷、琉璃等材料的发展创造了条件,更增添了传统建筑的地方特色。

自然条件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地,给予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影响。同时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认识、适应和利用自然条件,开拓建设,创造和发展了建筑环境的地方特色,是值得重视研究的历史经验,应该发扬的优秀传统。

二

传统建筑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,文化历史的发展,对于建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湖南经历了原始文化、楚汉文化、道佛文化、书院文化、世俗文化的突出发展,形成了湖湘文化的历史特色,决定了湖南传统建筑的历史进程,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影响。

原始文化的开拓

湖南是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之一,经考古证实,早在二三十万年前,就有人类繁衍生息。近年来在湘西的新晃、怀化、辰溪,湘北的澧县、慈利、石门、津市、益阳,湘中的宁乡,湘南的桂阳等10多县市,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达60多处。其中在新晃的沅水两岸就发现8处,采集各类旧石器百余件;经试掘的柏树林遗存,得旧石器20余件,经鉴定其地质年代,距今约10~20万年。以上说明湖南远古先民的活动已相当广泛。

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,已发现1000处左右,遍布全省各地,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及湘资沅澧四水下游一带。其中澧县彭头山遗址,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之一,经测定距今约八九千年,其文化层中发现有稻谷和建筑遗存,表明湖区先民已进入农耕的定居生活,成为我国最早稻谷和建筑文化的历史见证之一。此外石门皂市下层文化、临澧胡家屋场文化,和其后的大溪文化,以及相当于屈家岭文化、龙山时期文化等遗存,在全省比比皆是;以致边远的靖州筲篷坡原始社会晚期遗址,发掘出建筑遗迹50多座。反映了母系到父系氏族社会,以及氏族分化,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,并表现出与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密切联系,以及省内地区间的差异,呈现出湖南原始文化的丰富内涵,和先民们辛勤开拓的业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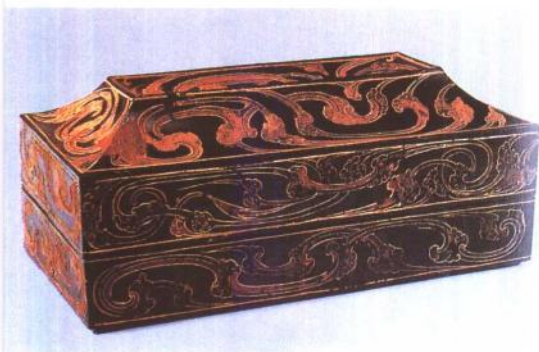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记载中的上古时代,湖南为“苗蛮”之地,在洞庭、彭蠡(今江西鄱阳湖)之间,包括湖南大部地区,曾形成以“三苗”著称的强大部落联盟,同华夏部落集团的长期战争,失利后纷纷迁往西南边远山区。诸多的历史传说,和留下的酃县炎帝陵、宁远舜帝陵、衡山祝融墓、赫胥墓、大庸驩兜墓等众多纪念遗迹,也是先民开拓的历史见证。

楚汉文化的崛起

早在夏代湖南属“九州”的“荆州”,商代、西周时期为“荆蛮”和“扬越”活动地区。商周遗址在湖南已发现千余处,其中石门皂市遗址,出土有本地铸造的青铜工具与兵器,标志着湖南在公元前16世纪已进入青铜时代。湘中、湘北一带出土的青铜器达400多件,为江南出土最多的地区之一。其中四羊

四羊尊(商代)





马王堆汉墓漆盒



马王堆汉墓漆盘

方尊、人面纹鼎、象尊、鱼纹尊等，为全国罕见，其工艺的精致，造型的秀丽，反映出湖南地方青铜文化的高度水平和独特风格，为楚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春秋时楚国势力进入湖南，置黔中郡于西部，随着湖南全境纳入楚国版图，由此中原文化与地方土著文化逐渐融合，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楚文化的独特风格。自 40 年代以来，在湖南 30 多县市，发现清理了楚墓 4000 多座，及文化遗址 20 多处。在长沙近 3000 座楚墓中，就有 186 座出土了铁工具和铁兵器等，达 30 种 241 件，反映了铁器的广泛使用，标志着生产力的突出发展。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，如漆器、玻璃器、铜镜、竹篾品、纺织品、皮革制品、天平砝码，以及举世首见的钢剑、帛画、帛书、毛笔等，展现其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，工艺美术的高度成就。从而为建筑的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，城池的兴建，至今留有多处遗迹，瓦的出现，更标志建筑发展的新阶段。

战国后期，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流放湖南九年，遍历沅湘，采风民间，创立楚辞骚体，留下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九歌》等不朽诗篇，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风格，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。湘人敬仰怀念，立祠纪念，演变至今。楚文化的发展，开创了湖湘文化的光辉序曲。

公元前 223 年，湖南统一于秦，分置黔中、长沙两郡。西汉设一国四郡，辖湖南境内 38 县。西汉为五郡 43 县。从而奠定了湖南行政区划和城镇建设的基础。

秦汉的统一，带来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，并与楚文化的交融发展，开创了湖南建设的新面貌。公元前 214 年秦开灵渠，沟通湘江与漓水，把长江与珠江流域水路联系起来，使湘江成为南北交通的孔道；东汉初又加疏浚改进，对于湖南的开发，尤其是湘江流域的加速发展，人口增长，城镇建设，成为湖南文化中心地带，产生了深刻影响。原来“楚越之地，地广人稀”，秦时湖南境内不过 40 多万人，至东汉永和五年（140 年）达 200 余万；特别是长沙郡人口密度从西汉 2.94 人/平方公里，增至 14.43 人/平方公里，增长了 4 倍多；零陵从 2.94 增至 9.47，增长了 3 倍多，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发展最快的地区^①。随着城池建设的普遍发展，如长沙原为楚南重镇，西汉初开始筑城，成为吴氏长沙国都。尤其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文物的出土，多达 3000 余件，其宏大的木槨、精湛的器物、丰富的书画，多属国内首见，充分显示出长沙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水平。

东汉地主经济的发展，特别采矿冶炼的进步，铁工具的普及，牛耕的推广，湖区堤防的兴筑，使农业生产有较大提高，以致朝廷多次从湖南调粮赈济中原，和中原移民湖南，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发展。建筑的类型增多，多层出现；砖的应用，拱券砌筑，标志建筑技术的新突破，传统体系的形成。

汉代政论家贾谊于前元四年（公元前 176）谪居长沙 3 年，留有名篇，脍炙人口，后人辑为《新书》58 篇，不少写于长沙，上承楚辞，下启汉赋，“沾溉

^① 引自《中国人口·湖南分册》

后人,其泽甚远”^①,影响深远。人称其为“贾长沙”,故湖南又有“屈贾之乡”的美名。后人以其故宅立祠纪念,明代一度名为屈贾祠,至今仍有遗迹。又如东汉湘人蔡伦,改进民间造纸技术,创制优质廉价纸张,得以普及推广,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;其故乡耒阳,至今仍留有专祠和遗迹。东汉医学家张仲景,任长沙太宗时,坐堂治病,医术高超,深得民心;曾著《伤寒论》,成为传统医学的经典,后人立祠,尊为“医圣”。

楚汉相承,形成了湖湘文化发展的一个高潮,促进了建筑的全面发展。

佛道文化的传播

三国时湖南属吴,设有10郡62县,西晋因之,东晋又增2郡,共60县,南朝各代又有所增多,至陈时为23州郡,65县,基本确立了湖南行政区划和城镇分布的格局。

这一时期,全国处于分裂状态,战乱频繁,湖南不免受其影响,但较中原相对安定。自孙吴大力开发江南,保护自耕农,促进土地开垦,设置农官,实行屯田;东晋荆江筑堤,沿江湖开垦加速;南朝进一步推广牛耕和稻麦复种,劝课农桑,经济得到较大发展,尤湖区成为重要粮食基地,出现“湖州之奥,人丰土闲”的景况。黄淮人口大量逃亡江南,自汉末关中“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”;西晋时巴蜀流民10多万人移入荆湖,永嘉以后又有山西、河南流民万多人涌入湖区西部;东晋在澧县设南义阳侨郡,安置河南等地流民。洞庭湖区在西汉时仅有2郡6县,至梁时已增至7郡16县,可见其开拓建设之速。长沙刘宋时为湘州治所,即扩建新城,梁时已号称“海内雄郡”,反映城市建设的显著进展。

随着宗教活动的传播扩展,道教的发展,佛教的传入,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。寺观建筑兴起,风景名胜发展,对于社会生活、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,塔庙道观成了城镇、景区的突出标志和景观特色。如衡山、岳麓山等地已成为湖南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,并为以后书院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基地。

早在汉代湖南就有方士道人的活动,修炼成仙的传说。西晋时已有道教宫观的创立,如太康年间(280~289年)南岳的南岳观、九真观等的兴建。尤自东晋大兴元年(318年)晋司徒之女魏华存,在南岳修道16年,诵注《黄庭经》,更著称于世,后建为黄庭观,延演至今。南朝时衡山又建有太平观、普贤观、玉道宫、九仙观、灵西观等,志称:“隋唐以前衡岳羽流白日冲举者不可胜数”,可见道教活动之盛。

佛教自西晋泰始四年(268年)竺法崇来长沙传法,在岳麓山创建慧光明寺,为湖南佛教活动之始,故称“湖湘第一道场”,即演变至今的麓山寺。东晋以后各地相继出现佛寺,南岳自梁天监间(502~519年)惠海创建方广寺、海印创建南台寺,至陈光大初年(567~568年)天台宗二祖慧思先后建大小般若寺,即今福严寺和藏经殿,皆延演至今,影响至及海外。



“汉并天下”瓦当

^① 鲁迅《汉文学史纲》



岳麓书院



永顺溪州铜柱

因此衡山形成了寺观林立,成为湖南著名的佛道胜地,全国重要的宗教中心,为文士活动,书院建设,儒释道交融发展创造了条件。佛道建筑的发展,又为传统建筑增添了新的类型,丰富了造型艺术,开创了新的面貌。

书院文化的兴盛

隋的统一,裁并州县,湖南改为8州郡,34县。唐又增为15州郡,56县。五代设1府1监12州,辖43县1州5监。宋为2府3军10州,辖61县。自此行政区划城镇分布基本稳定。

这是湖南的重要发展时期,经济文化繁荣,社会较为安定,北方和江西等地大量移民进入,人口激增。据史载,隋代人口仅28万多人,唐贞观十三年(639年)31万多人,至天宝九年(742年)达95万多人;宋代增长更快,元丰六年(1083年)为180多万人,至崇宁间(1102~1106年)达260多万,尤其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潭州(长沙)地区人口,由唐贞观时的4万余人,发展到96万多人,增长了20多倍,成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多的地区^①。全省人口不断增长,至宋末已达700多万。随着城镇、居民点及交通贸易发展,唐代整修灵渠,“百斛大舟,一天可涉”,湘江流域得到进一步开发。长沙、岳阳成为“湘岭要冲”,“百越、巴蜀、荆襄之会”,长沙城的扩建,基本形成了以后明清规模。岳州窑场已闻名于世,铜官窑场长达5公里,瓷器、茶叶已远销海外。矿业的发展,宋代郴州、桂阳13个银矿都形成了居民点,绍兴间银冶、铜冶、锡冶均达百处之多,铅冶亦50余处,铁器、铜器也销往省外。商业贸易的发展,城镇里坊制度突破,出现了商业街道,改变了城市面貌。

唐宋对山区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,剿抚兼用,并推广牛耕及复种技术;五代楚王与湘西土家族彭士愁结盟;宋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增设新化、安化、黔阳、会同、通道、绥宁、新宁、东安等县,因此资江、沅江得到大力开发,促进了文化交流,山区经济的发展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文化建设的兴盛,儒释道的峥嵘,书院和湖湘学派的兴起,形成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色。湖南佛道宗教发展达到高潮,寺观建筑普遍发展,特别是佛教南禅的二系五宗,发端南岳,影响全国,以致海外。南岳的福严寺、南台寺、长沙开福寺、宁乡密印寺、澧县龙潭寺、常德乾明寺、浏阳石霜寺、醴陵云岩寺等,皆成其重要据点,形成庞大的建筑群。尤其南岳、岳麓山等名山,更成为儒释道活动中心,文化交流的阵地。

自唐代贞观以后,湖南文人荟萃,文风大振,湖湘文化空前繁荣。大批文化名流来湘,游访、居官、定居、讲学、建设书院,留下诸多业绩,形成众多纪念遗迹,构成各地的文化特色。湘籍文化名人也相继出现,如欧阳询、欧阳通、李群玉、易元吉、怀素、周敦颐等。教育空前发展,官学普遍建立,现存学宫遗迹,也多创于此时。尤其书院的创立发展,唐代已出现9所,宋代更加兴盛,皆处全国之冠。岳麓、石鼓两院均誉为宋代“四大书院”之一。宋代胡安国、胡宏父子定居衡岳,建碧泉、文定、道山等书院,传两程之学,创立湖湘学

^① 《中国人口·湖南分册》

派。张栻得其传，又主讲岳麓书院发展为该派主要基地；并与朱熹交流学术，首开书院会讲之风，形成“岳麓千徒”之盛，成为书院建设的典范。书院多择名山胜地，开拓风景建设，成为地方文化中心，形成典雅的文人建筑的新类型。

文风所披，湖南风景名胜建筑，更加兴盛。如岳阳楼的建设，成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；南岳庙的创建发展，成为当时岳庙中之突出者；又如桃花源、苏仙岭、祁阳石刻等，至今著名的风景区，莫不兴起于此时。

湖湘文化建设，达到新的高潮，促进建筑技术和艺术全面发展，传统建筑体系的成熟。

世俗文化的普及

元代湖南属湖广行省，设 14 路 3 州，辖 59 县州；另有 3 安抚司，辖 12 州、洞、寨等属四川行省。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，设 7 府 2 州及 2 宣慰使司，辖 70 县州司；并分封有 48 个藩王，设有 12 个驻军守所。清代康熙三年（1664 年）置湖广右布政使司于长沙，为湖南单独设省之始，有 9 府 4 州 5 厅，辖 77 县及散厅、散州。加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，区划加密，城镇增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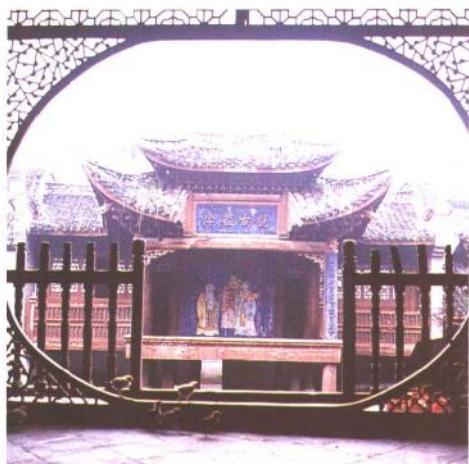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时期，每当改朝换代之际，都经较大战乱的严重破坏，以致人口锐减，田园荒芜。因此召民开垦，鼓励农耕，邻省移民大量迁入。尤江西举族迁入最多，有所谓“江西填湖广”之说，带来深刻的文化影响。随着恢复发展，至清代湖南人口又有突出增长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 年）达 867 万多人，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 年）已有 1892.9 万人。人口倍增，居住密集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元代实行土司制度，以土治土；明代相承发展，移入汉民，实行屯兵、屯田；清代改土归流，以流官取代土官，强化王朝统治，又大量移入汉民，也促使人口增长，民族文化的交融，生产技术的进步。明末清初已是“深山穷谷，石陵沙阜，莫不义阡耕耨”^①。湖区元明以来，截流淤田，筑堤围垸，扩大耕种，但湖面缩小，水患日增。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 年）湖南耕地为 1389 万亩，至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 年）增至 3439 万亩。明时已有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之说，清代乾隆时竟称“湖南熟，天下足”，为湖南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。

明代为巩固王朝统治，加筑城防，洪武五年（1377 年）长沙城改筑砖石城墙。城中建有钟鼓楼和庞大的藩王府。王府有五殿三宫，多达 800 余间，并围以藩城，形成城中之城，至今留有不少王府地名；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 年）拆藩城砖石，加固城垣，时称“城池崇屹，甲于他郡”，今仍留有天心阁一段，反映其旧有面貌。湖南其他城镇，亦多先后效仿改筑，筑城技术也因此普遍提高。

随着工矿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的较大发展，城镇生活变化，世俗文化普及，民间建筑发展。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，地域性行业性行帮形成，清代发展尤盛，会馆建筑大量出现，行业街道形成；宗教世俗化的发展，杂神杂庙日益增多；礼教思想的深入，宗祠、牌坊林立；祠庙增设戏台，成了群众娱乐集市场

^① 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

凤凰陈家祠



靖州县林家祠



所;商业街道突破城垣,沿江发展,改变了城镇面貌;《鲁班经》的传播,风水观念流行,产生了普遍影响,所谓“培文风,促文运”,各地兴建风水塔,以及文昌阁、魁星楼等,构成城镇的突出标志;人口增长,住宅密集,封火砖墙普遍发展,形成湖南城镇的突出风貌。18世纪中叶,湖南“田之归于富户者,大约十之五六”^①。19世纪土地愈益集中,一户占田多至万亩,建宅百间,乃至四五百者,极力表现其财力地位,也成湖南民间建筑的突出现象。

民间书院发展更加普及,遍布全省各地,以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,并取代官学,成为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和文化活动中心,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发展。由此湖湘人才辈出,涌现出如王夫之、魏源、谭嗣同等著名思想家 and 大批历史文化名人,以及革命人物,他们继承发扬了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,使近代湖湘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高潮。

由于清廷腐败,帝国主义入侵,道光二十年(1840年)鸦片战后,湖南成为近代革命斗争最激烈的省区之一。咸丰二年(1852年)太平军在湖南得到人民的积极响应,迅速壮大,但随着以曾国藩为首组成的湘军,成了镇压太平军的主力,以致“中兴名将,十九湖湘”。因此大批官佐衣锦还乡,仅长沙一地,增“官保第”13家,湘乡一县二品军功者达二千余家。因此购田置舍,竞建大宅成风,甚至一家数栋上百间者。同时大修祠堂、家庙,显示其宗族地位,巩固其宗法统治。中日甲午战(1894年)后,湖南又成维新运动“最富生气的一省”,有识之士在长沙办报纸、创学堂、组学会,传播新学,改革教育,各地竞相效仿;官绅筹建公司,开矿设厂,引进国外技术;开轮航,建铁路,一时风气大开。但不久遭到清廷扼杀,随着岳阳(1897年)长沙(1904年)相继开埠,划定租界,帝国主义侵入内地,倾销商品,掠夺资源,促使自然经济解体,农村破产,传统手工业遭到摧残,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打击。随着外国洋行、银行、商店出现,教会教堂、学校、医院深入各地,西方建筑技术和装饰逐渐传入,一些城镇出现传统与洋式建筑并存和相互渗透的现象,但一般城镇与广大农村则很少变化,反映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特点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,湖南又成为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。从黄兴、宋教仁等到毛泽东、蔡和森,以及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,反复较量,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迎来了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,开创了湖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。

传统建筑具有其时代性,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发展。当前面临着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挑战,对于传统建筑不仅应作为历史的见证,得到切实的保护,以体现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;更重要的在深入研究其历史发展规律,和优秀的传统精华,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,开创中国建筑文化的新时代。

三

传统建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。虽然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占有主导地位,

^① 湖南巡抚杨锡铨《奏米贵之由疏》

形成了建筑的基本统一的格局和体系,具有了悠久历史,并深刻地影响了各少数民族地区,得到交融发展,形成了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特色;但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,聚拢着生活习俗、审美情趣、宗教信仰等种种文化传统的差别,在交融发展中,仍发挥出各自的创造性,体现出不同的建筑风貌和做法特点。

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。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九黎、三苗、百濮及古越人等聚居开拓,并与中原华夏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,为灿烂的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郡县制度的较早建立和发展,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发展,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。

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,历史的发展和变革,阶级的矛盾和斗争,民族的迁徙和演变,因此形成湖南至今拥有汉、土家、苗、侗、瑶、白、回、壮、维吾尔等 50 个民族。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,汉族人口有 55846406 人,占全省人口 92.05%,其他少数民族人口 481.34 万,占全省人口的 7.95%。

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聚居在湘西和湘南的边远山区。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,开发山区,为山区的农业、林业、畜牧业的建设,付出了艰苦的劳动,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他们能歌善舞,保持着传统习俗,在纺织、蜡染、刺绣、编制、雕饰等工艺方面,创造出丰富多彩、生动诱人的作品,早为人们所赞赏。他们多聚族而居,形成村寨,适应自然地理气候条件,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团结互助,“帮工”、“帮材”,创造其生活居住环境,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和民族特色,丰富了我省传统建筑艺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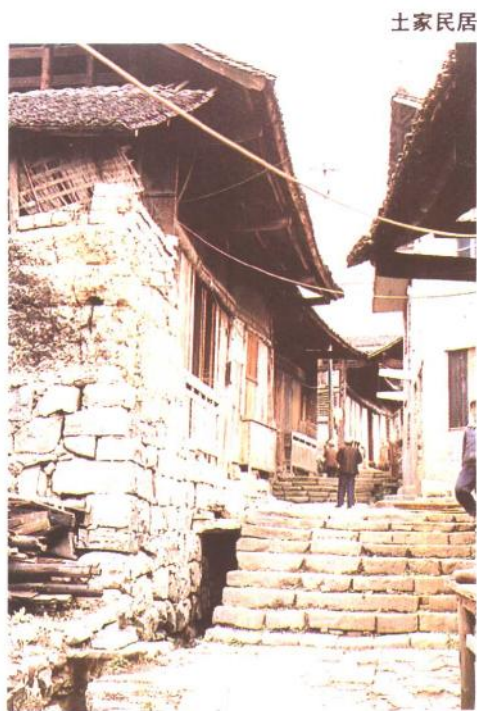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的少数民族,又以土家族、苗族、侗族和瑶族的人数最多,共达 456.9132 万,占少数民族总数的 95%。他们在湖南具有悠久历史,居住比较集中,更有其传统特色和建筑特点。其它少数民族人数较少,进入较晚,建筑已多采用汉族传统形式,较少差别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。在湖南先后建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通道侗族自治县、江华瑶族自治县、新晃侗族自治县、城步苗族自治县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、麻阳苗族、芷江侗族自治县等。另外,全省还建立了民族乡 82 个,其中有 69 个分布在民族杂居地区。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划时代的历史变化,为发挥民族特色,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优越条件,开辟了广阔前景。

土家族

在湖南主要分布于湘西的龙山、永顺、保靖、桑植、古丈等县。

族源属古代“蛮”人的一种,与古代巴人有渊源关系。有认为是战国时进入湘西的巴人一个分支的后裔,或认为是湘西土著与进入的巴人、汉人融合而形成的。秦汉时处于火耕水耨,渔猎山伐,种性血缘关系的部落生活。虽自秦以后,设有郡县,派有官吏,但控制松弛,时断时续,且战争频繁,其内部各部势力发展,亦变化不定,尚处于不稳定状态。唐代设置羁縻州县,对归顺首领委以官职,并准其世袭,加强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。并通过“贡赐”,促进



土家居

地区的稳定和民族间的交流。唐末五代动乱,土家首领乘势割据称雄,自署刺史。中和元年(881年)“溪州蛮”彭士愁拥有五溪地区20州,自立静边都誓主。后晋天福四年(939年)攻楚失败,次年与楚王马希范结盟,铸铜柱立于会溪(今存永顺王村),从此相对稳定,彭氏世袭统治达800余年,并形成封建领主经济。宋承唐制,设宣抚司、安抚司、羁縻州县,文化交流有所加强,生产有所发展,但仍处于刀耕火种,兼事渔猎的阶段。天圣年间(1023~1032年)先后在辰、澧等州土汉杂居地区,实行土兵屯田制度,设土丁弓弩手,计口授田,且耕且守,以防土官扰掠,使部分土民脱离了依附关系。元代建立土司制度,明代更臻完备。实行政军合一,寓兵于农,使其活动地域更加稳定。洪武二年(1369年)设永顺军民按抚使司,于永顺麻岔乡太平山南麓,今称老司城。直至清雍正八年(1730年)三百多年间,为湘西北土司的政治中心,至今仍留有遗迹。曾有“四门”,“八街”,“城内三千户,城外八百家”之说。其土司衙署称为“金銮殿”,署侧留有两青砖拱洞,称为“凉洞”、“热洞”,传为土司休憩之所。现存有嘉靖时建的祖师殿,和万历时建的“子孙永享”石碑坊,反映出受到汉族官式建筑的影响,已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艺术水平。但土司的统治,等级制度森严,房屋建筑上也有规定,土司衙署“绮柱雕梁,砖瓦鳞次;百姓则叉木架屋,编竹为墙;舍把头目,许竖梁柱,固以板壁,皆不准盖瓦。如有盖瓦者,即治以僭越之罪”^①。因此普遍保持着“依山茅舍,编制泥墙”的状况。明中叶永顺宣慰使彭显英,曾几度奉诏率土兵南征北战,晚年在永顺灵溪镇北筑“猛洞别墅”,建有花园、钓台、祭坛、祠庙等。嘉靖三十二年(1554年)永顺、保靖土兵,又被调往东南沿海抗击倭寇,连连告捷,被誉为“东南战功第一”;因此老司城又续有修建。万历间,土司彭元锦在老司城设若云书院,为其书院建设之始。但当时土民不准读书识字,“违者罪至族”。明代对于土司防范甚严,曾在其边缘土汉杂居地区,设卫所,建关隘,驻有重兵,实行“土蛮不许出境,汉人不许入峒”的民族隔离政策。明末清初,土民中土地私有已有发展,地主经济开始出现。清雍正八年(1730年)实行“改土归流”,废除土司制度,解散土兵,设置府州厅制,直接委派官吏和派兵驻防。从此领主经济解体,地主经济迅速发展。打破了蛮不出境,汉不入峒的限制,大批汉民及工匠迁入。因此带入先进生产技术,大量使用铁犁、牛耕、水车、水磨等,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,集市贸易兴盛,行会组织出现。随之学宫、书院、义学的建设发展,推广汉文、汉语,强制改革生活习俗,实行同化政策,以致一些民族特点逐渐消失,建筑上也基本接受汉族的影响,较小差别。

随着人口增加,城镇建设有所发展。近代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,掠夺资源,倾销商品、鸦片,残酷剥削,传统手工业遭到沉重打击。加之军阀横行,重重压迫,兵灾匪患严重,鸦片泛滥,农村破产,迫使人民不断地反抗起义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曾先后建立湘鄂西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,以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解放游击斗争,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,迎来了民族的彻底解放。195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,认定土家为单一的少

土家民居



^① 同治《保靖县志》卷12